
江门大良受降接收见闻

李益三

一九四五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一个星期左右，六十四军接到了第二方面军命令，着归朱晖日指挥，开往海南岛受降接收。八月二十八日，突然奉令改开往江门新会，接收驻在中山、顺德和新会等地的日军第一三〇师团。该军所属的三个师便按一三一师、一五九师和一五六师的序列，沿廉江、合浦、化县、阳江、恩平向江会兼程推进。除一五六师开抵廉江后留驻该地，拨归第二方面军副司令官兼粤桂南区总指挥邓龙光，由他指挥监视、接收雷州湾敌人外，其余两个师于九月廿四日先后开抵开平、台山县属，以主力配置于新会、台山、鹤山等地，监视该方面日军的投降就俘的实施。军部并组成了前进指挥所，以参谋长陈郁萍兼任该所主任，在驻地单水口部署指挥受降接收工作的进行。

八月下旬，国民政府曾宣布，以中国陆军司令何应钦为总受降官，中国战区的十六个受降区分别举行受降仪式。广州地区的受降实施办法，已由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于九月十六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见代表日军投降的日军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时宣读受降第一号命令，并由田中久一在降书上签字执行。六十四军因此不用举行受降仪式，只是通知日军一三〇师团派遣代表，于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到达单水口镇对岸的台山县公益埠胥山中学，接受该军前进指挥所主

任陈郁萍指示有关投降就俘实施的规定和要求。日军遵照电令的联系办法，派出了该师团参谋长吉村芳次大佐率领参谋石川中佐以及通译黑田、伊藤等乘坐挂着日本旗的汽船依时到达。经我方办理了检查证件等手续后，被带进胥山中学二楼。他们面对着坐在长桌后面的陈郁萍鞠躬致敬，俯首站立。

我国各受降区在接见日军投降代表时的提问程序、内容和指示、要求，可以说是千篇一律，成了公式化。即是：你叫什么名字，属哪个部队，军衔，职务，来这里的任务，有无证明文件等等。日军投降代表则依次逐一答问，有条不紊。但是，吉村芳次刚一站定，不待陈郁萍发问，即迫不及待地自我介绍，说他是日军一三〇师团参谋长吉村芳次大佐。奉师团长近藤新八中将命令，代表前来接受投降就俘和移交的实施办法。恳请多多指示，俾得回去转报遵办，并提交出代表身份的证明文件。这些发言内容由日军通译逐句传译得清清楚楚。陈郁萍默许他作自我介绍的发言，又接过了代表身份证明文件。对他的情况一清二楚。这时，陈郁萍本来可以对他说：“你既说你是日军一三〇师团参谋长吉村芳次大佐，受命来这里接受有关投降移交规定，并提交了证件。那我现在代表中国陆军第六十四军军长张弛中将，对你作出如下的我方受降接收的规定和指示……。”这是完全符合询问和指示的要求的。但是，陈郁萍却仍然套公式，背文句，照样从头开始向吉村芳次询问，问他叫什么名字……。骤听之下，吉村芳次突然感到莫明所以，有点愣怔怔，并怪难为情地凝神倾听，逐句答问。

陈郁萍对日军投降代表的指示和要求，除了明确地规定了我部队进驻接防日期、地点，指定日军交防后的集中地

点及我前进指挥所推进到江门后的联络办法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出有关当地的受降接收的实施，皆由该军前进指挥所负责全权指挥进行，限令日军除向该军投降移交外，不得向任何人或武装队伍交出防地或武器物资，又为了维持地方治安，授权日军在必要时可以采取自卫措施。说穿了这是准你日军可以使用武力抗击人民游击队的受降接收，只能由国民党独家包揽。其实，关于这一点，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早已根据何应钦给他的第一备忘录，在他给天皇派遣的朝香宫鸠彦王大将军的《军情报告》中毫不掩饰地公然扬言：“我将不把扰乱治安者，视作蒋介石所领导之力量，不得已时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因而陈郁萍代表六十四军遵照国民党当局下达的命令而对日军投降代表所作出的这些指示，只不过是肯定了冈村宁次的狂妄扬言的“合法化”，使日军一三〇师团如需要在当地抗击人民武装接收时，有所遵循，能更任意妄为而已。

依照下达给日军的受降接收的规定和指示，六十四军以一三一师为主力于九月二十九日推进接防江门，监视敌人和接管仓库。军部和前进指挥所旋于十月一日由单水口乘船进驻江门。深受日伪残酷统治的江门人民，当时对国民党政权寄以很大的期望和幻想。所以我们这支配备着一新耳目的全套美式装备的官兵刚一踏上码头，即受到了各军代表和群众列队欢迎。鞭炮声震耳，鼓乐喧天。顿时，军民浸沉在久别重逢的亲人团聚的欢乐气氛之中。小小的江门镇，盖搭了三十多座欢迎将士凯旋归来的彩色牌楼，把江门汇成了牌楼的大海洋。每座牌楼都贴上了显眼的表达真挚热诚的对联。其中有一对写得很通俗：“贮足姜醋腌罗蔔，薄备茶酒款英

雄”，围观的人们对这副对联的意义虽然清楚。但却惊奇为什么竟把萝蔔错写为罗蔔。后来由《复兴报》记者走访报导，才知道罗蔔没有加上草字头是意味着萝蔔已砍了头，象征要腌的是萝卜头，而当日人们都嘲骂日军是萝蔔头。这副对联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且文句通俗易懂，堪称雅俗共赏之作。

在我们备受江门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凯旋归来的鞭炮声中，竟有一支不受欢迎也不需要欢迎而静悄悄地在江门冒了出来的比我们先行到达的“凯旋”英雄队伍。它既不是战斗在抗日救国前线的正规部队，也不是活跃在敌后的诛奸杀敌的游击队伍，而是在沦陷区土生土长、甘作日军鹰犬的名牌汉奸武装。

广州及近郊县属相继沦陷后，我们只知道有隶属第七战区余汉谋指挥的周汉铃、袁带等挺进队在顺德、新会、中山等地活动。张发奎率领的第二方面军当日远驻广西，管不到广州地区，而现在有关江会的受降接收工作业已指定了由六十四军独负全责，这也是第二方面军所派回广东的唯一的部队。可是，我们从江门码头步行到设在紫茶路黄家祠的军司令部的时候，却看到了在黄家祠大门赫然挂着一块写着“第二方面军中新地区先遣军司令部”的长条木牌。我们都突然感到惊奇。不知道飞将军何时从天而降，更不知第二方面军的编制系统在什么时候孕育了这个怪胎。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汉奸彭济华的伪军第四十三师的变种。

应该肯定，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参加了许多重大的剧烈的大小战斗，建立了赫赫战功。很多国民

党的爱国官兵已光荣为国捐躯，彪炳史册。可是，以后为了对付战斗在敌后的人民游击队，控制沦陷区，国民党当局竟不惜勾结利用汉奸伪军，甚或指使官兵降敌投敌，实行“曲线救国”，这已成为人人皆知的事。现在，为了阻止人民接收胜利果实，使远处后方的国民党部队得以赶上来受降接收，除了授权日军放胆抗击人民武装的受降接收外，还利用汉奸伪军配合日军负责“维持治安”。因而这些在当地残害人民、无恶不作的伪军便立地成佛，沐猴而冠，马上做起了“抗日救国”的“先遣英雄”。

汉奸彭济华是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的得宠契仔，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所部伪军第四十三师是由他率领的原驻广州近郊的第二混成旅改编而成，下辖三个团，官兵三千余人，全部日式装备，是被认为较为完整的一支汪伪军队，驻防江门、新会一带。由于后台硬，在伪军里面，他趾高气扬，骄横跋扈。受蒋介石委为第二方面军中新地区先遣军司令（因碍于舆论，后于同年十一月一日由第二方面军将它改编为暂编第四支队，调驻会城，归六十四军指挥）后，逃脱了人民的惩罚，他俨然以在敌后活动有功的救国英雄自居，招摇过市，不知人间羞耻，遭受江门人民群众的鄙视唾骂。

为了监视敌人投降就俘，接管武器物资，六十四军除以所属一三一师已于九月廿九日开始先后进驻接防江门、新会、九江、官山、市桥、沙湾外，所属一五九师主力也于十月四日由台山开抵石岐，接管该地仓库；另一个团于五日推进容奇和以一部监视澳门的日伪行动。我部队按计划部署完成后，军部前进指挥所便由陈郁萍率领于十月八日从江门推进大良，驻在西关区公所，指挥点验接收，限日军于十月十

六日前把所有携带的武器资财归入仓库，等候点验后进入集中营。日军则派出了参谋石川中佐为联络官，每日按时前来前进指挥所联系，听取有关规定指示，回去转达遵办。

日军一三〇师团调抵中新地区，分驻在开平、台山、石岐、江门、顺德、东莞、虎门等地。师团部及直属队、野战医院皆驻沙湾。我一三一师接防沙湾，该地日军暂移驻新会。我一五九师接防石岐，交防后的日军开往大良附近集中。十月五日，我军全部接防完毕。日军一三〇师团除了留在虎门的官兵约二百八十名及留在广州、九龙的病兵约百余人未归队外，其余主力一万一千一百四十名在交防后皆于十月八日全部开抵沿中顺公路两旁的大良、大洲、鸟岛、鸡洲、羊额、仕版、伦教、荔村、严家围等地集中，由我一三一师三九三团对战俘的移防集中实行监视，并于十月十四日起由该团对战俘实施解除武装。十七日，已解除了武装的全部战俘徒手进入了设在原地的集中营。陈郁萍于十月二十四日正午在大良前进指挥所召开设立集中营所在地的乡镇保长及各界代表举行了座谈会，讲有关解除日军武装、设立集中营等情况；并要当地居民协助战俘管理人员，做好对日俘的监视管理工作，并规定：不得虐待战俘；不要替战俘藏匿任何物品；应及时举报战俘的违法行为；不准与战俘有任何来往或非法交易，违者将受法律处分。旋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对战俘进行点验，二十九日点验完毕，全部战俘关进了集中营。至此，对日军一三〇师团的受降接待工作，按照原来部署计划完成。

在点验过程中，战俘做到事事顺从、有礼貌、守纪律。每逢点验接收，他们都严肃站立，目迎目送，毕恭毕敬，俯首

听命。一般来说，战俘的情绪尚能安定正常。就记忆所及，在关进集中营以前，整个师团战俘并未发生过自杀闹事的事件。

对日军一三〇师团的受降接收任务，指定了由六十四军负责，且授权日军不得向其他任何个人或武装投降移交，当年驻守三埠的广阳指挥部获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想趁机混水摸鱼，迅即派出了两个曾留学日本的台山人（该部咨议）黄某等前往江门企图受降接收。因没有证件，计不得逞，反受日军奚落（听说日军送赠两盒小孩糖果给他们，讽刺他们幼稚不懂事，当日传为话柄）。其余活跃在该沦陷地带的游击队自然不敢妄动。军统的别动军等已忙于在广州掠夺接收财物，并不覬覦这小小的江会。因此整个受降接收工作都由六十四军顺利完成。该军接管的仓库物资也旋即由第二方面军派出了接收小组到番禺市桥接收。该军前进指挥所推进大良后，主要任务是负责部署有关监视战俘移驻集中，解除武装，对战俘所携带的武器装备等监督缴入仓库，检查战俘的行李衣物，计划设置集中营和对战俘进行关入集中营前的点验工作等等。

受降任务完成了，战俘进入了集中营。

（摘自《广东文史资料》第五十辑）

·新会城街名考·

炒米街 朝练

炒米街是条

短街，也是经营专业的街道。解放前茶楼饼铺所用的炒米粉，都从这里供应，后来扩展到附近的冲边（今镇前路的一部分）。解放后用机械磨粉，这里无形中衰落了。

近来，朱紫路扩展到与惠民西路衔接，这条街的名字无形取消，成为历史的名词了。

荷塘人民抗日斗争的历程

——纪念抗战五十周年的回忆

容汉勋 崔卓峰 容焕章 李瑞韶
容忍之 容 辛 容慧中 容竞存
纪录整理：许梓堂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荷塘，首先播响抗日救亡战鼓的，是三良小学的教师。

1937年8月，容汉勋在广州勤勤大学教育学院毕业。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他为了决定今后的行止，便亲到江门找老同学，中共新会支委书记陈翔南同志商量。陈翔南建议他先回家乡去，将抗日救亡工作开展起来，然后再作第二步打算。容汉勋认定抗日救亡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于是，他就返回家乡——荷塘，并在三良小学当教师，找到了立足点。于是进行串连发动工作。发现青年教师崔润华（崔卓峰）很积极。崔卓峰是新兴县人，是广州越山中学高中毕业生。在学时，参加了读书会，由于与突进社成员的联系接受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并参加广州大中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的示威游行。1937年春，通过突进社成员叶乃勋的介绍，到三良小学任教。容汉勋和他接触后，便有了得力的助手，

于是商定结合教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首先征得校务主任容子聘的同意（容子聘是广东陆军速成学校第三期毕业生，但他一生只有一次从军经历，就是九·一八事变后，投身十九路军，并参加了著名的上海一·二八抗日战役。当该军被迫撤离上海时，他就毅然辞职，返回故乡）。于是利用课余时间训练五、六年级年纪较大的学生，教他们唱救亡歌曲，学画漫画，学演讲以及排演抗日宣传的短剧。接着就向荷塘、白藤、马滘各个自然村开展宣传活动。

在这段时间内，容汉勋多次到江门书院街景贤商业学校向陈翔南同志汇报情况，听取他对工作的意见。

1937年冬日机对广州市进行狂轰滥炸，广州疏散人口。当时在广州读书或工作的知识青年回到荷塘家乡。如：李瑞韶、李肇荃、黎奉梧、陈能树、容国旭、容德柔、李羨贞、李小端等。有的是投亲靠友的青年：如尚铁珊、朱家骥、吴家盛等（吴家盛是从天津南来的知识青年，在广州认识了容汉勋），还有从日本归国回乡的青年容良坝。这一群青年，虽然出身、教养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目睹日寇暴行并身受其害，抗日爱国思想觉悟较高。一经串连发动，他们就和三良学校师生在一起，以无比的激情投身抗日救亡工作中去，在良村市及三良坊各地出版墙报，摘录时事新闻，向群众报导，建立宣传阵地。与此同时，又组织抗日宣传队，利用节假日，轮回到各自然村去，张贴标语漫画，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从而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但是，要把运动范围扩大和深入发动群众，还碰到不少阻力，尤其是在一些上层人士中，存在较多消极因素。根据陈

翔南同志的提示，须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因而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争取团结更多的中上层人士成为当时开展工作的重要一环。为使抗战宣传造成声势，我们通过举行沪战阵亡将士追悼会，掀起抗日宣传运动的新高潮。

正当荷塘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步步深入的时候，1938年9月，荷塘禾冈村的容光泉，收到新会县府转来其弟容定来（连长）、容钦昭（营长）在“八·一三”保卫上海战役中阵亡的通知书（容光泉也是行伍出身，曾当过炮兵营长，后失业回乡务农）。他持阵亡通知书找荷塘乡长李子瑜，要求在乡举行追悼会。李子瑜回答说：“这是你们容姓的事，你找副乡长容寿吾去商量吧。”容光泉只好去找容寿吾。容寿吾又说：“这是你的家事，你自己去办吧。”连连碰壁的容光泉，窝着一肚子气，又来找小学的同学、容氏族务委员、三良学校校务主任容子聘。容子聘说：“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我做不了主，让我同寿吾叔商量后，才答复你。”适此时，容汉勋也在场，听到这个消息后，即对容子聘说，应积极支持举行追悼会，作为对抗日救亡宣传扩大影响。于是由容子聘去说服了容寿吾，决定以乡的名义举行追悼会，筹备工作交由三良学校办理，并召开了筹备会，出席的有容寿吾、容子聘、容光泉、容汉勋、容焕章、崔卓峰。经过研究，决定了有关事项，从而开展了筹办工作。容汉勋又向江门陈翔南同志汇报了这情况，并得到他们大力支持，由秦一飞同志（中共新会支部组织委员）率领新会流动剧团参加追悼会，扩大了声势。这次大会在三良小学礼堂举行，会堂横额写着“荷塘各界举行沪战阵亡将士容定来、容钦昭追悼会”，

祭堂前置放各界敬献的花圈，会场周围还张贴了许多抗日标语。参加追悼会的有乡公所、容氏族务委员会代表、烈士家属、农、工、商、学各界群众，以及新会流动剧团成员，共五百多人。追悼会由容氏族务委员容子聘主持，副乡长容寿吾致悼词。学校及群众代表讲了话，新会流动剧团领队秦一飞同志也讲了话。

是日下午新会流动剧团在三良学校公演《张家店》，《烙痕》和《重逢》三个独幕剧。这是荷塘历史上第一次上演话剧，轰动了整个荷塘，吸引了无数的群众前来观看，收到很大的宣传效果。

组织荷塘流动剧团

新会流动剧团演出后，容汉勋、崔卓峰、容焕章等几个人。认为我们也要组织一个剧团，只有这样才能以提高宣传质量，收到更好的效果。我们将这个想法征询有关方面意见，首先向新会流动剧团提出组团的设想，他们积极支持，并定名叫“新会流动剧团荷塘分团”。乡中不少知识青年也表示拥护，并主动要求参加剧团工作。那时主要的女角是李瑞韶、容海云等，以后成为工作中的骨干。新会流动剧团除送剧本、赠布幕外，还答应派人到来辅导，帮助排练。容族办事处也答应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如煤油、化装用品、颜料、纸张等等，甚至同意借用关帝“菩萨”出巡时用的大地毯，作为舞台演出之用。在各方鼎力支持下，以容焕章为团长的新会流动剧团荷塘分团，于1937年11月宣告成立。

流动剧团荷塘分团是我们组织的第一个综合性抗日救亡

团体，它以演剧、歌咏、出黑板报和墙报、绘漫画、写标语、演讲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每一次演出，都有演讲、歌咏、戏剧穿插进行。一年多来，走遍了荷塘、白藤、马滘等三个乡的各个自然村，还到过潮莲乡、中山县的海洲乡、顺德县的江尾等地，上演过《烙印》、《重逢》、《马百计》、《张家店》、《血债》、《高压下》等话剧，均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在面上宣传的同时，我们还先后举办过民众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前者1937年秋在三良学校举办，办校的时间较短，仅半年多；后者1938年11月在南良禾冈村举办，有七年多。民众夜校及妇女识字班的形式，很受欢迎，收效较大，尤以妇女识字班更易在农民妇女中扎根。

在三良，农民最多最集中的是南良(禾冈)。在南良的农业劳动大军中，妇女真是顶了半边天。她们除了做家务外，还要参加农业劳动，她们会犁田、会种地、会挑担、会养蚕。真是一把把劳动好手；然而，因封建思想作祟，她们却被剥夺了受教育、参与乡事国事的权利。为此，我们特选南良为点，举办妇女识字班，希望能帮助她们从封建禁锢中解放出来。

办班之初，封建的阻力很大，虽然深入女屋中串连发动，不少女青年同意了，但到开学时仅有十多人参加，真是万事起头难呵。我们照样开课，从教识字，教算术，教唱歌入手，结合抗日爱国教育。由于这些学员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具有冲破封建束缚的抗争精神，他们学习刻苦勤奋，学习成绩很好。有一位学员容顺英，她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既会养蚕，又会犁田，初时父母阻止她去学。后来她说服了母亲而参加，经一段时间的勤奋学习后，成绩提高

得很快。有一次，其父叫她的已经上小学高年级的弟弟，结算养蚕账目，算了几天也没法算出结果来。容顺英接过来，很快就算清楚了。其父大喜，认为识字班有用，到处替我们作义务宣传员。我们的妇女识字班由于教学效果好，在社会上逐步赢得了信任，学员从十几人发展到四十多人，再发展到一百多人。这些学员，不仅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而且思想觉悟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参加了抗先队，有的参加了救护队，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家卫国贡献了一份力量，有的后来在解放战争成为骨干份子。

为妇女识字班出力最多的义务教员，也换了三批，其始是李瑞韶、容海云，继之是容慧中、容爱倩，最后是容顺英等，她们一任接一任地坚持了两年多，为荷塘妇女的解放事业尽了力量。

通过抗日救亡的宣传，不仅唤醒民众抗日保家的觉悟，而且也锻炼、提高了宣传队伍本身，也培养一批革命骨干。

中共荷塘支部的成立

经过前一段的抗日宣传工作，为中共荷塘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8年7月，三良小学的青年教师容汉勋、容淑娴(克波)、容焕章三人，参加了中共新会县工委在会城举办的新会青年暑期训练营。通过学习，容汉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容汉勋在荷塘，先后介绍容焕章、尚铁珊、朱家骥三人参党。1938年9月，成立了中共荷塘党小组，以容焕章为组长，这时，容汉勋已调佛山秀德中学任教，工作由容焕

章等三人接手，继续坚持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10月在顺德县良教乡省立女子第一中学工作的中共党员容忍之，调返荷塘工作。此后，中共荷塘党小组又发展了一批党员，计有容良坝、容国全、容掌盛、容树云（现名海云）、容慧中等。容汉勋于同年十月间又从佛山的调回荷塘并介绍了崔润华（改名崔卓峰）参党。容汉勋与崔润华接着调到江门工作，从此离开荷塘。1938年11月，经中共新会县委批准，中共荷塘党支部成立，容忍之为书记，容焕章为组织委员，容良坝为宣传委员。早在十月下旬日寇已占领了广州，接着顺德县城大良及禺南等地相继沦陷，中共大良支部的七位同志也转移到荷塘容忍之处等候林锵云、黄云耀等中共南顺工委领导同志派人联系。从这时开始，中共荷塘支部又跟林锵云、黄云耀（是容忍之的入党介绍人）发生工作上的联系，并成了他们的交通联络点。

建立抗先第四区队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省性的青年群众组织。荷塘抗先队是紧接新会抗先总队成立之后，于1938年11月组建的，它的序列是新会第四区队，队员的布质胸章统一由县总队颁发，当时是公开合法的青年抗日组织。区队部设在南良（禾冈）秋祖祠内，区队长由党支部书记容忍之以“刘良”之名兼任，副区队长是支部组织委员容焕章，中、小队长以中共党员为主，党对“抗先”队的实际领导是秘密的，党员只以个人身份参加抗先。抗先的成员，除党员，流动剧团荷塘分团成员外，主要是三良小学

的37、38年两届毕业生，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农民。

那时，虽然说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对各地方的中共组织实际是禁止的，党只能处于地下状态，因为国民党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条例》，并专门训练和组织特工人员派到各地“防范共党”。有了抗先这个公开而合法的组
织之后，我们的活动范围大得多了。~~对内~~，我们组织队员开展学习活动，如读《救亡日报》。学习《大众哲学》，学习《论持久战》等等。用先进思想和理论，加强内部的思想建设，使之成一股朝气蓬勃的抗日力量。对外，我们以抗先的名义，跟乡中的父老绅士打交道，进行统战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更多人拥护抗战、参加抗战。我们还以抗先的名义，到邻县各乡去，如中山的海洲、顺德的三华、白藤等，开展抗日的串连，结交了一批新朋友，如海洲的袁世根、袁勋、白藤的胡剑卿、三华的欧阳宜荇等。这些新朋友不仅成为我们抗日的同盟者，而且有的坚持革命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

为了表达荷塘各界对前方将士的关怀，我们在1939年春节，开展一次慰劳前线战士活动。我们的抗先队员，为了征集慰劳品，不辞劳苦上门劝捐。女队员容燕卿也参与这一活动，其父认为女儿抛头露面，丢了他的面子，一怒之下将她反锁在房里。但燕卿毫不屈服，跳窗出来继续参加活动。通过群策群力，我们把征集到的慰劳品，有炒米饼、生活日用品，一部份送到顺德县龙眼村的林锵云部队（广游二支队独立中队），兼与战士举行联欢；一部份送到鹤山谷埠的抗日第九大队（由陈翔南派容汉勋当该队政工队长）。

组建抗日武装队伍

广州沦陷后，从日寇的动向判断，侵略的铁蹄很快便践踏到我们新会来。在这严峻的时刻，县工委指示我们：组建一支由党组织掌握的武装队伍，以保卫家乡。

如何组建这支武装力量？党支部经过反复考虑，认真研究，认为：从荷塘的现实情况出发，只能组建一支白皮红心的武装队伍。荷塘的现实情况，主要特征是：封建宗族势力仍占据统治地位。这些封建宗族势力，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氏族之间的几次武装冲突，其中有两次容、李两姓的大规模械斗（第一次是1896年，第二次是1926年），造成村与村之间的不和，考虑到这个实际情况，党支部决定发动和团结荷塘各姓的一些知识青年，经过抗先队的宣传运动，在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突破了一些封建的氏族隔阂。然而在许多人的思想上还留下较深的痕迹，不会一下子消除。因此，统战工作显得特别重要，既要争取中、上层人士的支持，又要争取各姓氏的中、上层人士的友好合作支持。否则，村庄之间的集团力量互相抵消，就难以一致对敌。有过这样一件事：1938年冬天荷塘高村发生一次大火灾，全村三分之二的茅舍烧毁了，损失惨重。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高村虽是一个较小的村落，但它所处的位置正扼着良村与中山、顺德的交通咽喉，而姓氏存着隔阂，如果解不开这个封建之结，就影响与邻乡的联系。最初曾做过一次尝试，宣传队派人与高村小学校长联系演出。已约好借出场地和演出日期，可是，校董会主席却极力反对，事情便告吹了。我们吸取教训，抓住这次火灾的机

会，做好统战工作。我们发动三良学校的师生，组成募捐队，沿门发动为高村灾民募捐。结果募集了一批棉被、寒衣、粮食和现款，然后派人告诉高村小学校长，说三良学校师生带一些物品来慰问受灾的村民，请转告贵校董事会主席及村中父老。我们请了三良学校的主任容子聘先生带领高年级学生连同宣传队一起去高村慰问时，就看到高翰乔乡长率领一群村中父老、学校师生等，列队在村口等候，敲锣打鼓欢迎我们。从而把历史遗留下来的成见冰释了。

又如容、李之间的历史偏见，我们就抓抗先队员李瑞韶、容树云两个女青年，她们的亲密合作，成为两姓友好的典型。她俩到李姓、容姓的各村落去，做团结青年的工作，与当地青年开座读会，从全国形势谈到广州和家乡的抗战。接着，流动剧团又吸收了各姓的青年参加，于是以各大姓大联合的剧团，到各姓的村庄去演出，都受到群众的欢迎，收到良好的效果。

这就为荷塘武装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荷塘支部关于组建武装的设想，经县工委同意后，便开展了一系列筹建活动：

我们向有关方面了解到，荷塘乡早就根据新会县政府的规定，组建新会民众抗日自卫队第四大队”。按例，大队长一职是乡长兼任的，而李子瑜乡长已年过六十，精神体力既不适应，而思想上也不愿直接搞这些举枪、动剑的动作；听说县长要亲自到来检阅，要穿着戎服立正报告更使他手足无措。他认为这是苦差事，不愿干。他征求同村父老李启颐意见（李是广东省第五游击纵队司令部的参谋长），他推荐一个保定军校时的老同学容骏林，容骏林接受了自卫大队长名